

“务实”与“事功”：浙江精神的文化渊源

黄灵庚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

在当今传媒，类似“浙江现象”、“浙江经济”、“浙江速度”、“浙江模式”等等说法，屡见不鲜。“浙江”二字，似乎不再仅仅是居于东南一隅的地域名称，而是引领当今时代的、充满活力的一种精神象征。

经世务实

这种象征浙江精神的基本特征，似乎只需拈出“务实”二字，便可以囊括无余。浙人的“务实”精神绝非无缘无故，而是有其深层的传统文化基础。现代的浙人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精神趋向，都无法与其历史传统切断联系。追溯一下浙江精神的渊源，便不难发现，其多有历史上的“浙东学术”或“浙东学派”的文化血脉联系。

宋祚南迁以后，浙水以东地区以阐发儒家经典要旨为主体的学术空前繁荣：东莱吕祖谦以性命之学学承传关、洛中原道统，龙川陈亮及永嘉叶适等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，而悦斋唐仲友以经制之学自造一家。诸家之学并出于一时，习惯上统称之为“浙学”或“南宋浙东学术”，其要义是讲求“实用”、“事功”，与朱熹的“闽学”、张栻的“湖湘学”、陆九渊的“心学”并驾齐驱，构成了南宋学术的基本格局。元、明以后，浙东学术的重心偏移于甬、绍地区，始则王阳明倡导“良知”，继则刘蕺山发扬“慎独”，终则黄梨洲及其全氏兄弟标举经、史之学，为清代考据之先导，继承南宋“浙学”的文化传统，无不以“实学”称誉于时世。

道艺相兼

浙东学术传统在于“经世实用”，提倡“道”、“艺”相兼。道即儒家经义的要旨，是形而上的东西，是为“虚”。艺是才艺，是形而下的东西，是为“实”。“道”之要义需要借具体之“艺”来展现。习于射御之“艺”，方见彬彬揖让之“道”；习于书数占卜之用，方见《易》精妙无穷之“道”；习于簋簠筮豆、牲牢珪币之陈，方见有严君臣上下之“道”；习于钟鼓管磬、干戚羽旌之设，方见国家治理之“道”。无“艺”则“道”流于无所依附，无“道”则“艺”将失去灵魂。这个道理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”，现今的浙人似乎参透得特别深刻、独到，已经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，并牢牢扎根于其生命血液中。

试以浙江永康人追求技艺为例。永康在浙江省中部，隶属于金华市的一个县级市。陈亮当年创建的龙川书院就在于此。永康人向来不太理睬空虚的朱、陆理学，只爱听老龙川的事功论述，对陈亮“商藉农而立，农赖商而行，以求相补”的遗训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并“道”、“艺”相兼，付诸实行。所以经商之风、五金铸造业在永康与农耕一样极被看重，世代盛行不衰。

永康人摆弄五金的历史少则也有数百年。在过去，永康的铜壶、锅铲、铁铤、菜刀等产品，早已蜚声海内外；而如今，永康人用小榔头敲出各种型号的电动车、汽车，敲出这座雄居浙江中部的“中国科技五金城”。

并包兼蓄

浙东学派“务实”之处，还表现于不排斥异端，而是博揽广收，不主一家，器宇弘大，无门户之限。吕祖谦当年素与唐仲友不合，学术上多有异同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学术交往。据说，仲友门人傅杏著《禹贡图》成，吕祖谦弟大愚吕祖俭见而赞不绝口，称“是书可以集先儒之大成”。

这样的传统学术风格，已经渗透于现代浙人的精神世界中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浙江工业基础薄弱，人口众多，土地贫瘠，绝无优势可言。但可贵的是，浙人善取他方之长以为己用。浙江东阳市的建筑业发展过程，就是浙人“博取广揽”精神所展现的一个缩影。如今东阳市的中天集团、

海天集团、华夏集团等大型建筑行业，既保持其原有建筑风格，又融汇他家所长，并稳固地占据了世界上的建筑市场。

但是，浙东学术的历史文化并非全是精华，还有其消极一面，给浙人的影响也有负面的东西。譬如，浙东学派过于讲“事功”。同时，浙人普遍在经济生活中过于“精明”，趋利若鹜，给人留下“重利轻义”的不良印象。这都需要从历史文化层面上予以深刻揭示和总结。